

# 社会思潮的界说与 日本的社会思潮

纪廷许

## 一、关于社会思潮的中日差异

关于思潮及社会思潮，无论是学术意义上的概念诠释及涵盖范围的界定，还是社会生活中对该词汇的实际运用，中日两国均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试加以比较：(1)中国的界说广而繁，至今仍使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学科。而日本则狭而简，且基本不使用社会思潮一词，代之以社会思想统称之。即便偶见时代思潮、战后思潮、政治潮流等用语，前面亦从不加“社会”二字。仅有的例外是日本社会党的机关刊物《社会思潮》(1946—1967)，但实际内容是工运和社会运动史。(2)中国有关社会思潮的界说较具体和明确，日本则较抽象和笼统，仅很有限地使用思潮一词，且与“社会性风潮”即时代潮流在含义上雷同。虽在字面解释上有大致相通之处，但内容上却缺乏可比性。

上述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它首先涉及日本为何不使用社会思潮这一词汇，以及日本现在使用的思潮与我国的相关用语

的内容差异有多大。再进一步说，不使用社会思潮而代之以社会思想，是否意味着当代日本社会不存在我国学术界所说的社会思潮，或是因为所谓意识形态不同而引起忌讳。实际上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本文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观点占据优势地位。毫无疑问，解释上述问题的前提是首先明确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思潮究竟是什么概念。Trends of social thought 是世界性概念。因此，科学和客观地对社会思潮进行界定，应是第一急务。论述的顺序自然是从思潮及至社会思潮。

我国近代以来对思潮一词的经典解释，一般公认为始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简意赅的界说即“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呼应而汹涌，如潮然”<sup>①</sup>。在论述了思潮定义的同时梁启超又揭示了思潮产生的必要条件。他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吾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当然梁启超所论及的是清末民初时中国社会中知识群体掀起的学术性思潮尤以天择物竞、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为代表。此后有关思潮的概念研究逐渐深入，著名哲学家贺麟进一步提出了思潮的另一个特征，即代言人之说。他明确地提出：至于思潮也与个人的思想不同，思潮是一个社会在某一时期中所共有的思想蔚为风气，个人被其影响而不自觉，所以被称为思潮的思想，便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支配各个人的行为。思潮不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是社会的共有的思想。而在这思想的大潮流中，往往有少数人为其代言人。”<sup>②</sup>贺先生有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已经突破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四种学术思潮（汉代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的局限，勾画出社会思潮的轮廓，可视为当

代社会思潮定义探讨的先声。最近一二十年的相关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相对于上述中国近代关于思潮的理论性概括及定义上的界说，日本则不论战前战后（近现代史上）对思潮一词的使用都十分罕见。现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没有思潮类别的图书，亦没有以思潮为书名的书籍，仅有一本名为思潮的学术思想杂志。北京图书馆藏书中仅存一本北平国立图书馆时期日本村冈典嗣编著的日本思潮，内容是从宏观的文化思想史角度对日本历史各阶段进行理论性的概括。该书将日本史划分为六个时代分期：太古被界定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朴素主义的时代；上古是文化性朴素主义；中古为感伤性主情主义；中世为实行性主义；近世则演化为反省性主知主义；到了近代，则由于西洋文化的输入，脱离了以往的发展轨道，日本思想文化进入了另一方向的演变阶段。很明显，这种对思潮一词的使用，仍是文化性的宏观把握，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思潮不是同一范畴。相较哲学和人类文化学上的含义，中国对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概念。

不但日本的社会学、政治学辞典，即便是日本岩波书店1998年版的最新《哲学·思想事典》中亦无社会思潮这一条目。三省堂出版的《大辞林》中思潮的解释只一句话：某一时期的思想主流。<sup>⑤</sup>不列颠百科辞典中亦无社会思潮条目。在我国只有散见于有关西方政治思潮的专著中的一些解释，从不同侧面诠释政治思潮、文化思潮的一些特征。日本之所以不用社会思潮一词，主要是日文中国社会一词含义较为空泛，面广而难以及意。再就是近现代日本人做学问的实证主义传统和细分化倾向，导致人文社科领域中宏观性研究本身乃至思维视角相对欠缺，孤立性的个案研究盛行。90年代后宏观、微观结合的方法尝试初见

端倪，但尚未成势。实际上，像社会思想一词也只不过是一个学科类别，具体而论则只有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而且被真正称为学问的，也是思想史定义上的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至于思潮，见于日本有关辞典的，仅有文艺（文学艺术）思潮一个。如前所述，用于政治一词后缀的，则常用潮流，而只有日本学术界和新闻界偶尔使用中国学术界惯用的思潮。日本知识界及新闻媒体、文学艺术界对社会生活及大众思想的影响和渗透比较迅速而深入。同时，随着现代日本社会生活的富足化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政治意识淡化、思而不潮或思多不成潮的趋向。或者说社会思潮出现了相对化、潜在化的特点。这也是日本虽有社会和思潮二词却不复合使用的另一个原因。从社会思想的演变视角，对战后日本的社会思潮进行宏观把握的两个表面对立，鲜明而深刻地反映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变化的观点，令人玩味。一是 60 年代中期铃木正高在《战后日本思想大系》中提出的“离开了主义，日本就无法思想和行动”的论断；二是 20 世纪末早稻田大学教授西川润所断言的“在日本，主义已经消亡。现在不是主义驱使 人，而是人利用主义的时代”。30 余年来社会物质生活的巨变和 90 年代后冷战体制的终结，特别是信息化、全球化的迅猛浪潮，竟磨砺掉了日本人百余年来赖以思想与行动的“主义”。以中国人的哲理而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思想都不存在了，浪潮又从何而来？结论似乎有悖常理，然而又令人深思。二战结束 55 年来，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人的观念意识，即所谓深层思想是否发生了中国人很难相信或不好理解的嬗变？应该说这是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重要课题。它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对与中国有着极深历史渊源而又存在着诸多矛盾纠葛的邻国的客观认识，同时又关系着中国如何看待、进而如何对待日本的重大问

## 题

日文中又有“社会性风潮”一词。荣泽幸二的定义是：社会性风潮是指各种社会集团及阶层，或者多数国民所共有的有关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价值意识乃至价值判断，以及风靡不同时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等综合性的倾向。其特点有五个：(1) 对不特定多数的个人及集团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判断，乃至行为模式给予极大影响。特别是在国内外局势不稳或历史的转折时期，即政治动荡时期出现的反映各种政治性、思想性问题的社会性风潮，在体现时代状况的同时，起着促进历史性变化的起爆剂和转换器的功能。(2) 形成社会性风潮的主导力量是多样化的。既有特定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以及国家权力等统治阶层，也含括与其相对抗的政治势力、企业集团等社会力量。特别是大国的动向和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值得强调的是，社会性风潮的内在结构中包含着时常与特定的风潮产生共鸣，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少数派这样一种对抗关系。两者关系的变化，对风潮起着导向的作用。(3) 社会性风潮将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行为方式，乃至现状正当化甚至美化，即意识形态化的同时，还具备将不特定多数的人引导向某种共同性行为的精神性、情绪性启动力的作用。特别是极易与民族主义意识契合的政治性、观念性社会风潮中，这种特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典型事例有战前的“圣战”意识等。(4) 随波逐流的从众心理及其思维定势，是支撑社会性风潮的精神性、心理性基础。某种观念或行为的流行现象的社会强制力及规范性，亦与日本人这种思维定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深层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只要不是与个人的利害关系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求得安全的要谛是遵从社会习俗和随大流；生存的智慧是，与其孤立，不如随潮流而动并且尽快地融入主流。(5) 社会性风潮是通过诸如“文明开化”、“富

国强兵”、“破除阀族”、“拥护宪政”、“改造”、“危险思想”、“忠君爱国”、“质实刚健”、“非常时期”、“圣战”、“灭私奉公”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流行语，象征性地表现出来。<sup>⑤</sup>

上述界定及分析，实质上不仅对战前，同时也对战后的日本社会思潮的内涵及外延、表现形态、形成因素、社会作用以及日本的特殊性进行了明确的概括归纳。特别是其定性依据，以战前日本占主导地位的极端国家主义社会思潮下形成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为基础作出，对当代日本的社会思潮，尤其是至今仍鼓吹“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右翼政治思潮，具有深刻的剖析作用。“社会性风潮”的涵括范围实际上将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潮都纳入其中，体现出“时代潮流”意义上的广泛性特点。

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及同一词汇的使用，日久弥新且政治性较强。例如，《辞海》对思潮的定义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sup>⑥</sup>《现代汉语辞典》同一辞条的解释为：“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sup>⑦</sup>直接对社会思潮作出较具体而系统界定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2)中王锐生先生所撰写的辞条。其对社会思潮(Trends of social thought)的定义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在定性把握上，该辞条与严格划分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为不同层次的观点不同，而将三者揉合到一起，认为它们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该辞条称：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在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方面，该辞条举出(1)群众性；(2)易变性；(3)易逝性；(4)相反性(走向反面)；(5)能动性(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等。该辞条认为社会

思潮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是当时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活中突出矛盾的反映。社会思潮基本上分为正确与错误两类。

除上述比较系统的定义诠释外，尚有多本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及现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专著，亦对社会思潮的界说进行了不同侧面的定义诠释。从观点上的差异或补充的角度看，与大百科全书辞条的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有关社会思潮的定位，以及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大变动时期、和平稳定时期、转型时期等）的社会思潮基本特征的变化方面。例如，有的将社会意识划分为社会心理、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形态共三个层次，认为社会思潮是处于中间层次的社会意识。它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席卷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一代人乃至许多代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倾向。<sup>⑥</sup>该书的突出观点是认为社会意识三个层次是一个互为表里、即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它从处于中间层次的社会思潮入手，可兼顾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另有一本对社会思潮作出深入明晰论述的，是由高瑞泉主编、华东大学出版社于 1996 年 7 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该书对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其 1)最后都归宿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历史大课题，(2)我们很难找到有哪种近代思潮没有丝毫民族主义的意味这一对社会思潮最基本内容的定位，不但抓住了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乃至一些政治学说、思潮的根本不同之处，也对准确、客观地把握日本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界定其范围的基本框架。<sup>⑦</sup>中国始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并持续百余年的政治动荡中，以救亡图存为基本内容的民族主义一直是社会思潮的核心。而日本在“西力东渐”的民族危机意识中发生的倒幕维新运动之初，牺牲他民族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已然胎动并渐次发展到极端国家主义。一个国家在不

同历史阶段，特别是变动或转型期的基本发展方向（趋势）以及导致这种方向或趋向产生的源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判断的内在动因，应该是诠释和剖析社会思潮的理论座标。

1999年4月就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国历史学会前会长戴逸、现会长金冲及以及戚其章、张磊等史学或思想史学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概述了对中国社会思潮的认识。<sup>⑩</sup>戴逸强调指出的是主导性社会思潮，认为符合国情、适应历史潮流、被广大群众接受是主导性社会思潮的基本要素。金冲及进一步论及了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及其主次关系，指出“在同一时代往往存在着几种社会思潮，反映出那个时代中不同阶级、阶层或人群的不同思想、观点和情绪。但不论怎样复杂，总有一种思潮起着主导的作用，引导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戚其章重点提出了近代社会思潮的两个时代特点，即走近代化道路的历史主题与爱国主义是进步社会思潮的原动力。张磊从文明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关系阐释社会演进的过程，提出“社会思潮居于社会精神文明的主导，对社会机体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重大作用；还由于社会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文化取向，而文化取向则对社会演进的趋势具有重要影响。至于以往社会思潮对后来社会思潮的导向和素材的源头作用，更是不言而喻”。此部集中了20余位学者，耗时6年完成的四卷本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涉及面宽，甚至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文化领域内的各种思潮，使社会思潮成了政治、文化、学术等各类观点主张的集合体，颇似一座近代中国的思想博物馆。

实际上在认识和把握社会思潮时遇到的难点问题，一是如何既看到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恰当地区分它们；二是如何将政治思潮及学术性思潮与社

会思潮的差异认识清楚，而避免混为一谈。以近代中日两国为例，如同样对于义和团运动，有的将其界定为仅仅是仇洋情绪，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也有学者将义和团运动以及以后诸如抵制洋货等均上升为社会思潮。而自发性、非系统、多变性等恰恰是社会心理的特征，与思想的自觉性、系统性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思潮迥然有异。更多的是把政界、学术界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升格为社会思潮认识，尤其是以××主义为称谓的学术性思潮或政治性主张最易被混淆于社会思潮。而实质上这些思潮的范围、深度均局限于某个阶层，甚至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一种社会思潮的某个侧面的反映。有的则是借题发挥，明显地属于夸大式的新闻炒作。更有政治战略、阴谋策术式的所谓思潮或思想，则纯属吃政治饭的人出于功利目的杜撰出来的产物。日本鼓吹军事大国战略及国家主义思想的一股右翼势力，其突出的特点是没有思想理论支撑以及行为上的盲动性。如赤尾敏为首的皇民党之类，几辆宣传车、几身旧军服招摇过市，声嘶力竭地喊几句打倒、粉碎之类的口号。几十年来日本人对此已见怪不怪，实际上影响极为有限。

与上述极端的例子不同，社会心理中特别敏感或特别沉稳的一部分，如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拜金主义、关系学等等，并非带有大时代主题的社会思想，不是社会思潮，也并非从过去精神至上时代走向反面，即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的反映。这是在概念上将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混淆起来的必然结论。二者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社会心理纯粹是观念形态的，而社会思潮这一时代思想的主流，是对时代主题的反应和对时代要求的对应。它以多种载体反映出来，须伴以持续的跨阶层大众运动以及综合反映国民意识的新闻舆论、文学艺术、政府政策方针、政界、学术界的主流意识等背景衬托，体现和代表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发展方向这

一时代主题。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往往在社会思潮上最清晰最集中地体现出来。其典型实例当首推战后特别是 50—60 年代开始的日本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思潮，其发端和集大成于 1946 年 11 月 3 日颁布、1947 年 5 月 3 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尤其是第一条象征天皇制和第九条放弃战争为代表的和平民主原则。它的时代意义，超越了日本这一个国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和平主义的旗帜。其比较彻底的和平民主主义内容及其在改宪程序上须 2/3 多数才能通过的刚性原则，不但成为广大日本国民捍卫和平与民主的最强有力武器，同样也成为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妄图扭转国家发展方向的最大障碍。围绕和平宪法的政治较量（改宪和护宪）是日本战后社会政治的最核心点。反映战后 50 多年来时代变迁中日本人思想上最深层变化的社会思潮，与此密切相连，它是反映战后日本社会及其思想变化最基本方面的镜子。

人心向背一般是通过社会思潮的形式体现出来。战后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延续性，特别是主线的一贯性特点十分突出。从 50 年代初反对日美单独媾和 反对美军基地 反核、反战，反对日美安保条约 到 90 年代要求废除冲绳美军基地，反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50 多年来群众性政治运动和斗争此起彼伏，虽然随着时代内容的变迁，其激烈程度和影响范围有所增减，和平民主主义的思想底蕴却并未改色。

关于社会思潮的基本界定标准，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牺牲的法国著名年鉴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下述一段话可能不无启示。他深刻地指出 社会思潮的波动 技术的更新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它对历史的影响决不亚于一次政变或战争。历史上最深层的东西往往是最确凿无疑的。<sup>①</sup>布洛赫超越了特定的社会或国家，从左右人类历史命运

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思潮，同样从更广阔的视角对社会思潮进行了宏观的定位。这种对历史宏大和深远的把握，对于界定当代日本的社会思潮亦具有深刻的启示。

## 二、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宏观把握及其演变轨迹

综合上述围绕当代社会思潮的不同侧面的理论性尝试，从跨国界的共性研究角度予以借鉴归纳，笔者认为应首先廓清当代社会思潮应包括的基本内容和范围，它既不能等同或混淆于政治思潮、文化思潮等，也不是此类思潮的集合体。界定的明确恰当应是第一义的。尤其应留意社会二字。以此擎纲张目，客观和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一左右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潜在因素。其研究上的意义不论对历史还是现实都是带根本性的。其次，迄今为止有关社会思潮的研究多集中（关注）于动态性，即过程及形式特点的变化方面。相对地忽视静态性研究，即社会思潮的成因及内容本质方面。换个角度讲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思潮的变化性特点，更引人注目且相对来说容易把握。而更深层次的、确凿无疑的历史沉积，比如日本的国民性、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及其随时代发展而起的变化等等，却相对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然而，正是这方面的因素恰恰才是构成当代社会思潮的前因或基础。同样以战后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思潮为例，它的基本源头是战后民主改革的最高成果和法律上的集大成——《日本国宪法》。形式上确实是美国占领军主导的，甚至有所谓麦克阿瑟的钦定宪法之说。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部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和平宪法，亦是作为战争加害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国民源自内心深处的对和平和民主的渴望，是经过具有国民投票性质的1947年4月众参两院大选的政治审查，即日本大多数国民政治

意愿的反映。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形成是日本从近代天皇制和军国主义体制下的精神解放，以及政体上的革命性变化，外来压力的决定性作用与深刻的起持续作用的日本人思维方式中那些最深层的根性（譬如对现实的容忍、文化的多重性及移植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认识和把握社会思潮背后的日本人思维方式方面，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元先生的概括颇有启示。他在《日本思想史》一书中，重点提出了日本人思维方式中的三个主要特征，即（1）对于现实的容忍；（2）重视特殊社会关系的倾向；（3）非合理性倾向。<sup>②</sup>三个特征共列举了 25 条内容。其中与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或者说构成社会思潮本源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1）现象界中把握绝对者（如战前的天皇、战后的和平宪法——本文作者注。以下括号中均为作者注）；（2）现世主义（源于经济生活价值取向等）；（3）文化的多重性（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佛教、儒教思想、天主教教义的影响，现实生活中美欧政治、经济、法律及科技思想的传播及渗透）；（4）缺乏坦率的批判精神（导致政治上，特别是历史认识上的暧昧，欠缺大的历史感和事非感等）；（5）国家的优越性（高于个人意志的国家优越意识源于岛国危机意识及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共识）；（6）尊崇天皇（战前的近代天皇制到战后的象征天皇制虽有本质之别，但是日本多数人思想深处对天皇仍然尊崇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和民族的认同感。实质上是以天皇为具体对象而又超越了天皇个人的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尊严感）；（7）宗派、派阀的封闭性（大而言之，日本人对自己周围特定社会关系的归属感强烈而体现出所谓团队精神。换言之，像奥姆真理教这样被取缔的邪教团体至今在日本全国仍有 47 个组织在公开活动，其封闭性和顽固性竟致于此）；（8）强调社会活动（从节日的庆祝活动到游行、请愿、签名运动、春斗、反

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直至最近的反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大规模集会等，均可说明这一特征）；<sup>(9)</sup>非逻辑性的倾向及进行逻辑性归纳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欠缺（中江兆民早在 100 多年前就在其著《一年有半》中讲过日本没有哲学的惊人之语，实质上指的也是日本人思维方式中这种先天性的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的辩证思维能力。在历史认识、国家观及战争观方面的相对主义色彩，与此亦有内在的联系）；<sup>(10)</sup>直观式且情绪性的倾向（非逻辑性及欠缺理论归纳能力，与直观式情绪性可说是相伴而生的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通过这几项特点研究，可以把握到日本社会思潮的哲学意蕴，即蕴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出时代倾向和日本人的精神气质。

相关研究领域中，中村雄二郎与加藤周一的观点亦具有代表性。在当代一般日本人的历史观及战争观背后，中村洞察到善恶观和动机与效果这两个基本问题方面的日本特色。他指出：日本人往往不认为是恶的行为，而对方却认定为恶；只要动机是好的、结果不好也不为过的“委过主义”及缺乏理性思辨和是非感的“场合主义”思维比较普遍。<sup>⑨</sup>加藤周一则重点剖析日本思想文化的二重性特点，认为岛国根性表现出强烈的内凝聚力与排他性，其思想渊源于前近代性的皇道主义意识和日本主义文化。

以上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作为理论铺垫之一，对战后日本的社会思潮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兼有方法论上尝试的意义。目的主要是对社会思潮产生的背景研究进行补充。因为相关的研究一般多从社会性背景，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对社会思潮的产生追本溯源，而鲜有从思维本身的特点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相关性的考察。增加一个角度，可能会对社会思潮产生的本源性原因——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治状况的变化，与思想潮流的背景性因素——思维方式及思维定势联系

起来，加以综合性考察，才能得出一个比较科学、客观和完整的结论。由此及彼，不仅对日本的社会思潮，涉及当代日本人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战争观等等值得深究的课题，运用多视角的综合分析，透过历史过程中最深层的相对不变的部分，洞察时代发展中变化着的因素才能辨别它的全体和局部、主流或支流。

试以上述几点为基准，对日本的社会思潮进行定义尝试的话，是否可以界定为：某一时期内，在一个阶层或者跨阶层的相对多数的日本国民中，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特别是时代课题，并体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从而产生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及强烈持久的心理共鸣的思想倾向。本来，社会思潮（Trends of social thought）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定义亦应该是统一的。但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几乎不使用此词汇。对一个看似简单而实则复杂的社会思想现象进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界定，难度较大。即便是在国别研究中，能否及如何界定和运用社会思潮，特别是其定义诠释和涵盖范围目前仍尚无定论的情况下，研究仍处于探索性的阶段。但也正因为如此，此项研究才更有意义。

以上述几项基本内容为纲，展开对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考察，可以看到清晰脉络的，是战后初期至 70 年代上半期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思潮。它的特征是以和平宪法为旗帜和基础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原则的确定，与实践运动的结合，即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及观念意识的转变，与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形成互相促动的格局。甚至可以说近年来围绕日美新防卫指针的群众集会及冲绳地区反对美军基地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等也在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延长线上，是 70 年代后和平主义从激烈的大众运动形式化为沉稳的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

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民生活的逐步富足化，日本人的

价值观发生变化，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政治意识的淡化相伴而至。一言以蔽之，给人以思而不潮或曰思多不成潮之感。日本的社会思潮呈现出相对化、潜在化的特点。日本民众的社会关注已从政治诉求转向维持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及其结构上的缺陷，即日本作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强国，却在综合国力三要素中的国家强制力（就维护本国及地区利益而言的，对世界事务的干预和影响力）方面不足，以及以政治军事大国为战略目标的政治势力的活跃，日本又涌动出一些保守政治势力及学者为代表的政治思潮，如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等等。这类政治思潮虽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影响，却不具备社会思潮所具备的思想理论的体系性及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力，以及实践层次上不同形式的大众性政治运动。政治思潮在代言人（多为政治家或学者）或称代表人物这一特征上虽与社会思潮相似，但波及范围和直接影响却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某种政治势力或集团之内，难以引起各阶层大众及新闻舆论等的广泛而持久的呼应。有的虽表面上颇具来势，并有国际局势变化的相应背景，但因不符合日本多数国民的利益要求及宪法原则而流于政治鼓噪。当然，某些政治思潮的主要载体是执政党的某些派别、一些有影响的新闻媒体及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等的言论，有一定的对国家政策的冲击和影响力。这往往使人容易把它看作社会思潮。实际上，以明确的界定标准来看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可以说和平主义仍根深蒂固于日本人心中，成为战后 50 多年来日本社会思想的主流，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日本国家政治的基本方向。毋庸置疑 战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经历了几个阶段性、历史性变化的过程。从 1945 年日本战败到 1960 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这 15 年间 是战后恢复与重建时期 经历了

战后民主改革这一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社会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思想观念的震荡和解放，为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对战前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的清算、否定和道德反省开始，到颇具声势的工人运动，反对日美单独媾和，反对美军基地、反战、反核、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等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构成了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明确和集中的体现。这一时期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主要是近代主义思想家、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真男以及大家久雄、清水几太郎 后政治上转向 筹学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羽仁五郎、井上清 以及川岛武宜等。作为民主主义旗手的丸山，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出发，将 1946 年日本颁布的新宪法定位在世界和平民主主义前沿的高度加以认识和弘扬。他倡导唤起市民主体的精神革命，把民主化视为永久革命的进程。羽仁与井上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制度性原因的角度，对近代天皇制进行批判，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很大反响。历史学家大家久雄从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剖析日本社会的后进性，将战前界定为前近代社会。川岛武宜则从日本家族制度的封建性出发，同样将战前定位在前近代。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对时代主题的反映和对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反映在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之上。以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及其基本政策的奠基人吉田茂为主，战后日本统治集团的主流派所制定的轻军事、重经济的方针，有着民心所向、民意所归的社会背景。《日本国宪法》中放弃战争及军备的和平主义原则的巨大威力和作用，甚至使首相吉田茂在坚持放弃战争及军备的原则方面，比日本共产党更为坚决和彻底。当然，其根本原因在于贯彻战后日本专注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的需要。而这一基本政策方

针又是在民意基础之上、在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制定的。当代日本思想史学家武田清子教授指出：在大正民主运动的思想状况中度过青年期、而在战败时长大成人的日本国民，怀着解放感迎来了新宪法的诞生。<sup>④</sup>在这种思想自觉性的因素中，除战后进步社会思潮及国际大背景之外，甚至还包含有吉田茂等为代表的、虽为战前官僚却属于自由经济派的战后新官僚阶层。他们在战后日本决策集团中，因在内政方面基本顺应了民意，而保持了政权和政局的较长期稳定，在外交上对美一边倒，求得了美国的核军事保护而白坐安全车。除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之外，这个阶层在战前从思想观念上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社会思潮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思想观点的差异与战略及政策上的不同，是导致改宪与护宪、承认或否认过去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还是军事大国道路等一系列明显对立的内在原因。

必须强调的是，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是日本社会各阶层中有良知的多数人，是社会党及多数工会组织、文化知识界中的进步力量。1955年体制所形成的保革抗衡的政治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和平民主主义社会思潮在政治上的反映。社会党等虽无法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但作为革新性政党，发挥了民意导向的巨大政治作用。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战后日本的社会思潮进入了第二个大的时期。从形态上看，社会思潮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70年代初反对日美新安保条约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虽可以将其视为60年代初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的继续，但内容上已发生了变化。如同东京大学校园内悬挂的“造反有理”的横幅一样，日本的红卫兵们实际上在政治上已迷失了方向。与工会为争取提高工资而搞“春斗”类似高速增长带来的生活富足化，特别是日本社会结构的均质化倾